

当代中国媒介风险报道透视

秦志希, 夏冠英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秦志希(1948-), 男, 湖北鄂州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新闻理论研究; 夏冠英(1958-), 男, 湖北黄石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 博士生, 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

[摘要] 风险反思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当代中国媒介在反思社会风险, 但这种反思受到过去相关报道理念羁绊。他们在反思风险中进行权力博弈, 但他们的这种博弈受到自身“工具性心理”阻抗; 他们在反思风险中呈现积极处世态度, 但另一面这种处世受到某种宿命论倾向影响。消除对风险报道起阻碍作用的因素, 依赖当代中国媒介自我监控、自我修正、自我调适的反思性。

[关键词] 中国媒介; 风险报道; 自我修正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4-0491-06

工业革命后一个时期的现代化, 有人说它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 而话音未落, 现代社会风险理论又以为它为现代人带来了“安全丧失”。要解决前一个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等提出人们的精神要回归中世纪, 即重建人的宗教信仰; 而要解决后一个问题, 吉登斯(Antony Giddens)等风险理论创导者则以为要建构一种面向未来的文明, 即通过风险评估与控制去把握未来。而事实上, 二者都是针对自然科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 在强调一种“人文救世”理念。而在风险评估与控制这种“人文救世”主张中,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则看到媒介能起到一只“文化眼睛”作用: 它通过对社会风险的报道, 可以开视风险上的“瞎眼公民”, 从而引发他们进行风险治理^[1](第92页)。

在现代风险理论中, “风险”(risk)是个相当灵活的概念, 一般是指存在于人的评价性认识中的一种潜在危机。但在风险陈述中, 这种理论又将现实发生的危机表述为风险。而在风险源层面, 它所说的风险又指激进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高科技等)带来的种种危害——我们知道, 中国这方面情形与西欧并不相同。这样在意涵上, 我们说的风险, 主要指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语境潜在和现实已发生的种种危机。

一、风险反思

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不断查问与审视自身生存状态的存在物。”^[2](第8页)伴随人类文明进程, 人稟具了一种认知、应对风险的思维: 反思。在人类意识的萌发期, 面对自然风险, 人必须敏于知察, 并通过调节自身实践予以应对, 这就造就了他“外察式”风险反思; 而随着人类道德、精神生活的展开, 尤其是当其有了“自律”意识, 人对自身道德、精神上的危机开始

了“内省式”反思;而且,“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越变得显著。”^[2](第 5 页)作为一种思维:反思,总是人关于身内与身外世界问题、危机、风险的反思,而这样,当人认识、应对风险,其思维即反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风险理论说。在现代风险社会,反思性是人的一种现代性。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媒介稟具了这种反思思维。改革,“它有时难得像在泥泞中行走,费大力迈进一步,待你拔出了脚,那脚印立刻又被周围的泥泞淹没了。”^[3](第 155 页)新闻名篇《鲁布革冲击》这种关于改革维艰的反思性表述,可以视为当时媒介现实稟具风险反思思维的表征。回头看,1980 年以后,这种风险反思在当代中国媒介呈现如下走势:

一则,在拓宽视域。如《鲁布革冲击》、《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媒介所反思的风险,多体现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潜伏的问题,其风险反思的视点在“国计”而不在“民生”。而 90 年代以后,中国媒介的风险反思开始向“民生”领域拓展,因为此间崛起的大众化报纸在“服务大众”报导理念引导下,注意告知百姓的生活风险。而近年,如针对“帝王戏”盛行,中国媒介在揭露一种由此传播开来的封建权谋文化的危害性(《深圳特区报》2003 年),如在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话题下,它在评析执政党巩固其执政地位面临的挑战(《新闻周刊》2004 年第 3 期:《中共加强执政能力如何日显重要》),其风险反思又在投向文化、政治领域。

再则,在深化。这体现于灾难方面的风险反思。出自市场意识,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大众化报纸注重报道突发事件,但这类报道看重的确乎是这种事件的娱乐性,基本缺乏深层次思考,即使它呈现反思性,但其反思是表浅的。值得注意的是,1987 年《中国青年报》的《红色警告》系列报道着意挖掘与反映大兴安岭火灾隐含的官僚体制等问题,而 1998 年中国媒介报道长江洪灾,亦着意挖掘与反映其间所反映现出的相关决策对环境管理的漠视,二者呼应,它们显示了 1980 年以后中国媒介灾难方面的风险反思走向深化的一脉:相关风险理论认为,现实中大致有三种风险反思:(1)只看到风险现象的“现实主义”反思,它是表浅的;(2)从风险现象看到风险背景的稚朴“结构主义”反思,它是简单的;(3)以为风险是制度性、决策性风险的所谓“制度结构主义”反思,它则是更为切要的^[1](第 29-39 页)。

中国人有风险反思方面的意识。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预则立,不预则废”等传统生存智慧,中国传统文化有过风险反思倡导。就中国媒介而言,在近、现代,如王韬的《循环日报》、梁启超的《时务报》、陈独秀的《新青年》等,它们曾以对民族危亡风险的激烈反思,显示出中国媒介这方面的意志力与能力。当然,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如马寅初对人口的风险反思而遭迫害,极左政治曾使人们对社会风险的反思成为一种思想禁忌。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风险反思则成为中国人一种普遍的思想实践:如当时兴起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其实是对人们曾受禁锢的反思思维的解放;另外,如说“落后就会挨打”,某些由政治权威发出的有关风险反思的社会感召,化为了当时社会学上的主导思想,成为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主题。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精神语境中,当代中国媒介开始了他们对社会风险的反思。

在现代社会“反思性正在成为生产力源泉”^[1](第 147 页)。同样,如前所示,2005 年中央政府出台了能源危机防控部署;同年,公众抵制“烤薯条”等具有致癌风险的产品,而此前媒介就对相关风险有过大量报道与舆论。这些表明,当代中国媒介的风险反思正在引发公众、政府的相关“互动”,在成为社会的一种助益。风险反思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吉登斯提出的所谓现代人要确立一种面向未来的文明观,其意涵即是现代人的组织未来、塑造世界要靠风险反思^[4](第 125 页)。

但又有这样的个案。1970 年云南的一起地震,伤亡、损失严重,而当时仅有的一条简短消息“只字不提受灾,而且把震级压低了”。30 年后的 2000 年该地对伤亡者有过追补性悼念活动,而相关报道同样不提当年的灾难后果,只是对所谓灾区人民的“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津津乐道^[5](第 153 页)。这一个案告诉我们:禁忌风险反思时代的所谓“报喜不报忧”,当今以“传统”的形态在作用于媒介;这种作用其实是在阻抗媒介的风险反思,即它使这种反思在当今中国媒介难以实现稳定化。

如果说传统是过去被重复的现实性,那么这种现实性一般由权力建造:“传统总和权力结合在一起”^[6](第 37 页)。中国大陆首例艾滋病人被发现于 1985 年,而大陆媒体对此作出报道是在 1994 年以

后^[7](第23页),如果将当中长达近十年的媒介“缺位”看做是曾经的“报喜不报忧”在媒介的“传统化”,那么其始作俑者应是相关权力主体:它们禁止报道。再则,某种“过去”在当下的重复,还是卡西尔说的社会进程中文化的“稳定化”与“进化”间固有张力的反映;对于如上所述的2000年媒介关于云南地震依然“报喜不报忧”,曾有人就从媒介的所谓“历史惯性”予以归因。而着意于人的能动性的理论认为,传统的生成总是在人们从过去走向未来时刻其自主性缺失所致:吉登斯就说人对过去有一种“成瘾”现象,这种“成瘾”就是一种人的自主性被“冻结”的状态^[9](第44页)。这反过来说,包括当代中国媒介,对于过去的会妨碍其当前某种有益实践的东西,人要做到不将它“传统化”,又在于他能够加强其自身的自主性。

二、权力博弈

1998年长江洪灾中,九江段4号堰溃堤。事发第二天,《中国青年报》作了报道,当天上午,相关管理部门指责该报严重违反新闻纪律,后来朱镕基视察九江称“不能向群众隐蔽灾情”,该报才得以摆脱困境^[8](第296页)。对于当代中国媒介报道社会风险,这件事表征出其间存在一种权力博弈(Power game)现象:一方面相关权力在打压这种报道,而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媒介依托政府权力或将政府权力转借为自身一种权力,予以抗衡。

李普曼说:作为社会安全守望者,媒介要审视社会的“不测风云”与“浅滩暗礁”,并要“及时发出警告”。报道社会风险是媒介职责,它对于媒介具有职业上的正当性。然而,作为一种世界现象,对于媒介的风险报道,相关权力机构总是保持高度警惕性,即便标榜崇奉新闻自由的美国政府,在“9·11”危机期间,也对“新闻记者、报社进行威胁:不许说这个,不许说那个”^[9](第120页)。对于不同国族的相关权力机构,他们干预媒介风险报道,其中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原因或许就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所谓脸面(face)意识与前台(front)观念:“共同在场”的人们,对自己的脸面有着一一种“以防他人审视与拆台的自我呵护(self-warmth)的情感”^[10](第95页),这样,人在社会舞台表演,总把伤脸面的事隐藏于“后台”(behind),以保证在“前台”的自己受到赞誉。

当代中国媒介风险报道受到两种权力制衡。而两种权力主体给出制衡,各有不同原因。

首先是媒介管理者给予制衡。对于媒介2003年的“非典”报道,广东省委宣传部门首先要求统一报道口径:既要求报道“病情得到初步控制”,以便“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恐慌”;而当相关报道出现,便声称媒体影响了社会稳定,禁止媒体再作报道^[11](第136页)。显然,这里的媒介管理者干预报道,出自他们的一种社会稳定观。“稳定”,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表征与致力方向,而毫无疑问,对此,媒介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为了稳定而限制媒介的风险报道,从长远看,其结果可能是相反的:“风险愈少为公众所知,愈多的风险会被制造出来”^[11](第185页),这即是说,它会导致更高层次的社会恐慌与社会不安定。“风险思维当然有其不安定的一面,但这是寻求一种使结果稳固的一种手段,一种开拓未来的方式”^[14](第154页)。吉登斯的这一表述道出了风险认知方面短期的社会不安定与长期的社会稳定的关系,它提示人们确立一种长远的社会稳定观。

再者,风险发生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封锁信息、防堵报道等行为,显示出他们制约媒介风险报道的某种权力:权力在表现层面的特征之一是对他者的制约性。如有资料显示:中国媒介事关非典的第一篇报道,是广东河源市向当地报界提供的“该地没有流行病”声明,四川资阳市卫生部门告知媒介该地的“怪病”(猪链球菌感染),是在发现这种病症一月以后;2003年中国11名记者受贿隐瞒山西一起矿难,始作俑者则是事发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宣传部长;他们合谋用“金钱”来防堵记者报道。

有人说,主要由于当前中国媒介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还是一种从属关系,在批评报道上它还不拥有自主权利,批评报道的得以展开,主要得益于党和政府的支持。同样,在风险报道上,面对如上两种权力的制衡,当代中国媒介是从党和相关政府的支持那里获得某种传播权予以抗衡、坚持运作的。

1980年媒介对渤海2号沉船事件的披露,引发中央追问相关领导责任。自始以后,中央以及省市

(地)党政部门,注意把媒介的风险信息作为追惩风险责任者、加强社会风险治理的依据与助力,在客观上支持了媒介的风险报道。不仅如此,诸如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某些新闻政策亦在支持媒介风险报道。就中央而言,支持风险报道,原因之一是它要依托这种报道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相关权力向下分散和转移,社会组织出现“非集中化状态”,传统的、韦伯(weber)说的那种依托科层制组织所实行的组织化社会控制不再十分奏效,这样,中央政府不得不依托媒介等方面传递的信息实行社会监控,这是着眼于社会治理而依据新信息调适决策或作出新决策的社会监控,即是吉登斯说的现代社会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

另一方面,即便当代中国媒介对党和政府关系是一种依附关系,而包括风险报道,其传播权力又决非完全由它从党、政部门那里转借而来,媒介传播的能动性亦可以使它出现权力自产或自赋权力现象。《法制日报》记者刘林山的相关作为是众多表明这种现象个案中的一个。天津大邱庄前领导人禹作敏,曾作为致富带头人而闻名全国,而成名后,他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从1991年至1993年,刘林山顶住种种压力,坚持通过“内参”报道其罪行^[9](第295页)。从报道权力方面看,刘林山进行这种报道长达3年的“坚持”,则可以被看成是他自产或自赋这种权力的现实。在传统的权力观念中,人们总以为只有对于权力机构才有权力可言,其运动方向也总是自上而下,但福柯看到:权力受动者亦可以产生一种抵抗权力,他亦禀具某种权力生产能力,他说:“权力来自下面”^[12](第94页)。

总之,在风险报道上,当代中国媒介同对其制衡的权力相博弈的那种权力,既来自它对党、政相关权力的转借,又来自它的自产。我们看到,对于当代中国媒介的风险报道,因为有这种权力博弈,它才有了现实的可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实践中,某些媒介以其对制衡它的权力的屈服,使这种博弈“失语”。

南方某电视台“非典”时期的一次采访是这方面的实例。这家电视台记者在广州某医院采访时,意识到在场护士、医生所戴口罩是风险信号,拍摄前,要求他(她)们摘去口罩,以示“非典”并不可怕^[13](第10页)。显然,对于这位记者,其做法是在配合、服从当时主管部门下达的“要减少社会恐慌”的报道指令;而从精神方面说,它反映了这位记者甘愿接受制衡权力制衡的工具化(instrumentalized)心理。可以说,这种工具化心理,根源于中国记者对多年来他们面对的需要服从的垂直性权力关系的习惯:“权力关系通常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根植于被那些遵循他们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模式中,尤其是根植于例行化的行为当中”^[14](第279页)。著名记者李庄曾以严厉的自我解剖精神,道出了他对这种需要服从的垂直性的权力关系的习惯,以及这种习惯所形成的他的工具性心理。他说,自己曾在“极左”和“集权”时期,“长期的一种习惯”是:如果发现自己的想法与“上面”不一样,就以为“是自己不对,就赶紧‘看齐’,并检查自己为什么‘赶不上’”^[15](第252页)。上面提到,福柯说权力关系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使动式”,它还可以是“自下而上”的“互动式”,显然,当代中国媒介要清除在制衡权力面前的工具性心理,有待于牢固树立这种“互动式”的权力关系观。

三、处世态度

一种风险的现实性及其是否会衍化为高后果风险,相当意义上取决于人应对风险的态度,这样,现代风险理论提出风险社会人的“处世态度”问题:

一方面是消极处世,它包括:(1)人在风险情景“过一天算一天”的对风险的听任态度;(2)消解风险焦虑的对风险的“玩世不恭”态度。这种消极处世态度的文化根源被认为是人的“天命观”或“宿命论”,其后果是现实中存在我们在面对“却没能去对付的风险”。

另一方面是积极处世,即人在风险情景有一个所谓“富于命运特征的时刻”,这个时刻是:(1)人质疑与风险相关的“常规惯例”,(2)人对这种惯例予以“改变以及重新调整目标”。说到底,这种积极处世就是人就某一风险问题谋求改变,它被认为由现代社会风险压力所激发,其结果是人通向安全的“新路得

以开辟”^[4](第150-153页)。

面对社会风险,当代中国媒介的积极处世表现为:

其一,审视过去。诚然,如《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鲁布革冲击》等新闻名篇,当代中国媒介的某些风险报道旨在揭示既有危机及其相关旧体制上的因由,而不刻意去设定治理方案,但即便这样,这种报道亦呈现出一种变革意向。“人如果不意识到他现在的状况和过去的局限,他就不可能塑造未来的形式”^[2](第227页),反过来说,人要塑造未来,首先他必须去认识其具有局限性的过去与现在——而就那类不给答案、只反映危机的报道而言,它们确有如此用意:引起全社会对问题的重视、思考、求索^[15](第251页)。

其二,着意创新。尽其可能,当代中国媒介在反映风险的同时还着意思考风险治理方略。针对当时经济发展困局,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闻名篇《中国改革历史方位》指出这一困局由粗放型经济模式所致,同时它还提示要破解这一困局在于经济发展“及早依靠科技进步”^[3](第173页)。显然,这种报道着意于修正过去、除旧开新,作为一种风险反思,它即是现代风险理论说的那种展现人应对风险的能动性的反思:人“依据新的信息”而对其“社会活动”等“作出阶段性修正的敏感性。”^[4](第22页)这种着意革新的风险反思现在依然被坚持。连接中国南海与安达曼海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大企企图操控的要道,而中国竟有五分之四的原油进口依赖此道,2004年6月间《中国青年报》载文指出这是中国能源的一种风险,同时该文还对如何防控这一风险作出思考:即一要修建另外的原油进口渠道,再是中国同日、韩携手另找原油出路。

海德格尔认为人由现实之“畏”而“操心”,由“操心”而走向“未来”。如所周知,由于民族危亡、社会危机等压力,“操心”于“变革”、“改革”,是近代以来包括媒介在内的中国人一种突出的思想实践,是他们在风险情景中的一种显而易见的积极处世。诚然,传统文化上的宿命观念,农耕人随遇而安的生存态度,以及诚如某些学者所看到的文化心理上悲剧精神的缺乏和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它们曾使中国人面对风险也有过“过一天算一天”的处世,甚至有过阿Q式的在灾难临头时刻的“玩世不恭”,但一般说,对于现代中国人,这种处世不再具有主导性、常规性。

但有调查显示,在不太宽松的舆论环境中,当代的某些新闻从业者对于自己专业方面的认识有着一一种新生的宿命倾向。在这种环境中,他们面对老百姓的苦难常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而随之以为,像《南方周末》那样对自己社会使命感的认同及其践行,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媒介实际“没有那个权力”。显然,这些新闻从业者关于自身在专业上的力量、价值、权力与现实舆论环境的关系,偏重去认识环境对自己这些方面的制约性,不计或不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具有的能动性及其可能的效果,这样,他们就把自己在这种环境中的“弱小”、“无价值”、“无权力”客观化,将其视为某种无以抗拒的必然或命定的东西,而作为一种认识,它即呈现宿命倾向。

某些新闻从业者这种对“自我弱小”的认同,其实是马克思以来的许多社会学家都在论说的人的一种“无力感”:即个体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其自主性被剥夺的一种感受。包括当代中国某些从业人员,这种感受有其产生的现实根源,苛责其存在是非理性的。但就人在社会实践必要的积极性而言,人又应该致力于消除这种感受。这方面吉登斯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吉登斯说在一种不能避免磨难的人生中,活着的人其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自主,因为他只有通过自主控制和能动地去克服磨难才能生存^[4](第225-227页)。这种说法对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有一种“无力感”,甚至会因其产生某种“宿命”观念的时候,不妨作出这样的自我意识:我们恰恰是“有力”的,因为自主性和能动性与我们的生命同在。

一如现代风险理论的相关认识,风险反思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因此,当代中国媒介有必要坚持推进其风险报道。而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媒介的这种报道,正呈现贝克基于现代事业发展的某种曲折性所指出的现代文化的一种特征——堵塞(congestion),这即是它在反思风险,但这种反思受到过去某种报道理念的霸权,它在进行权力博弈,但这种博弈受到“工具性心理”阻挠,它在风险情景呈现积极

处世态度,但这种态度又受到其某种观念上宿命倾向的影响。贝克还说:“你并没有陷入堵塞,你自己就是堵塞”^[1](第 168 页),意即要消除堵塞,在于被堵塞者这方面的能动性。按照现代风险理论的观点,这种能动性即是人自我监控、自我修正、自我调整的反思。当代中国媒介要消除其风险报道的种种“堵塞”,从总体上说,亦要靠这种反思。

[参 考 文 献]

- [1] [德] 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 [德]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3] 时统宇. 深度报道范文评析[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 [4]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5] 巴晓芳. 大众化报纸论析[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6]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7] 李 岩. 意识形态下的大众话语秩序[C]. 新闻与传播评论(2003 年卷).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4.
- [8] 孙发友. 新闻报道写作通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9] 李希光. 等. 全球新闻传播[M]. 广州: 广州日报出版社, 2002.
- [10] Beck, Ernest. 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 [11] 孙旭培. 从非典时期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机密[C].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04 年卷.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5.
- [12] Burchell, Graham &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 Mentality; with Two Lectures by an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13] 陈力丹. 非典报道与生命意识[J]. 新闻记者, 2003 (9).
- [14]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15] 单 波. 20 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车 英, 于华东)

On the Risk Repor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QIN Zhixi, XIA Guangy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QIN Zhixi(1948-),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journalism theory; XIA Guangying (1958-), Associate professor,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bstract: Reflection on risks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modern society. According to risk repor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y are in reflection on social risks, but hindered by certain traditional opinion on relevant reports; they are in power game, but counteracted by certain instrumentalized mentality; they are in an ac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risks, but obstructed by certain fatalism. Based on the angle of media's activit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o eliminate negative factors above,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needs reflection including self-monitoring, self-revision, and self-adjustment.

Key words: Chinese media; risk report; self-revision